

DOI: 10.19832/j.cnki.0559-8095.2025.0024

泛突厥主义与凯末尔主义的早期关系

——以“突厥之炉”为中心的考察

敏 敬

(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20)

摘 要: 泛突厥主义是 19 世纪兴起于突厥语知识分子中的民族主义思潮。20 世纪初, 奥斯曼帝国和俄国的泛突厥主义思潮合流, 催生了最大的泛突厥主义组织“突厥之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突厥之炉”与凯末尔主义者合作, 为推进土耳其民族独立和现代化改革做出了贡献, 扩大了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社会的影响。随着组织规模不断扩大, “突厥之炉”逐渐危及凯末尔主义者的统治, 最终被改造为共和人民党的下属机构“人民之家”。但由于改造不够彻底, “人民之家”沿用了“突厥之炉”的原班人马、使命和组织架构, 从而为泛突厥主义提供了新的生存空间, 并为冷战后土耳其实行泛突厥主义外交路线埋下了伏笔。

关键词: 土耳其; 泛突厥主义; “突厥之炉”; 凯末尔主义; 共和人民党

泛突厥主义(Pan-Turkism)诞生于 19 世纪后期,^① 以倡导复兴突厥语文化、加强突厥语族群间的合作与交流为主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 泛突厥主义转向政治民族主义, 企图建立统一的突厥国家。现代土耳其国家独立后, 泛突厥主义受到了压制, 发展相对缓慢。而随着冷战结束、欧亚地缘政治发生变化, 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重新活跃起来, 形成了泛突厥主义的外交路线, 使土耳其在突厥语国家的合作和一体化建设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泛突厥主义沉渣泛起, 增加了地缘政治变数, 其动向引起了国际社会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潘志平较早注意到泛突厥主义的崛起与危害, 揭露了泛突厥主义的虚假和不切实际, 认为泛突厥主义“得不到任何国家的欢迎, 即便是土耳其政府也不敢予以公开的实际支持”。^② 还有学者对土耳其泛突厥主义外交的动机进行了分析。^③ 这些成果虽然强调泛突厥主义的政治目的, 但是没有阐明土耳其政治与泛突厥主义的内在联系。敏敬认识到这一不足, 指出泛突厥主义与作为土耳其官方思想的“凯末尔主义”存在思想和组织联系。^④ 张玉艳则梳理了泛突厥主义的发展轨迹, 指出土耳其社会和各派政治力量都深受泛突厥主义的影响。^⑤ 然而上

收稿日期: 2024-01-11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百年变局下的中东族群问题及治理研究”(22JJD81003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敏敬, 历史学博士,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兼职教授, 研究方向为中东历史和民族问题。

① 中文语境下的“土耳其”主要指现代土耳其国家, “突厥”指的是分布在亚欧地区的各个突厥语族群。本文根据语境和上下文关系, 分别采用“土耳其”和“突厥”称谓, 分指不同的研究对象。

② 潘志平 《论土耳其与泛突厥主义》, 《史学集刊》, 2004 年第 4 期。

③ 参见侯艾君 《“新泛突厥主义”运动及中国意识形态安全: 挑战与应对》, 《国际安全研究》, 2016 年第 2 期; 宋斌 《从泛突厥主义到新奥斯曼主义——论冷战后土耳其外交政策调整》,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 3 期。

④ 敏敬 《凯末尔主义与泛突厥主义关系探析》, 《世界民族》, 2006 年第 6 期。

⑤ 参见张玉艳 《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的由来与发展》, 《国际政治研究》, 2019 年第 5 期。

述成果同样没有说明泛突厥主义与凯末尔主义之间的联系如何形成,对相关问题仍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相比之下,国外学者对泛突厥主义与凯末尔主义的早期联系给予了更多关注。^①

本文以上述研究为基础,以“突厥之炉”(Türk Ocakları)为研究案例,分析土耳其建国前后泛突厥主义与凯末尔主义的合作过程。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民族独立和现代化建设中做出过贡献,并因此在其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由于与凯末尔主义存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等方面的矛盾,“突厥之炉”最终被改造成了新的宣传教育机构“人民之家”。但是这一改造并不彻底,“人民之家”基本继承了“突厥之炉”的原班人马、使命和组织结构,导致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继续存活,也为冷战后土耳其实行泛突厥主义外交埋下伏笔。

一、泛突厥主义与“突厥之炉”的成立

泛突厥主义从一开始就深受近代西方民族主义和突厥学研究的影响,试图用民族主义的方法解决突厥语族群面临的种种危机。早期的泛突厥主义通过创办报纸和建立秘密社团等方式进行宣传,逐渐发展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和政治运动。1912年“突厥之炉”成立,标志着泛突厥主义实现了组织和理论建构的重要突破。

1912年3月25日,在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数名军事医学院的学生秘密集会,决定成立泛突厥主义组织“突厥之炉”。^②与会者选举菲力特·阿赫迈德(Ferit Ahmed)担任主席,优素福·阿克楚拉(Yusuf Akçura)担任副主席兼秘书长。会议委托阿克楚拉起草组织纲领。纲领指出,“突厥之炉”以改善突厥人的教育、科学、社会和经济水平,促进突厥种族的进步和语言的现代化,提高“伊斯兰人民”的地位为己任。纲领规定通过开展大量文化和教育活动来达到上述目的。^③与会者还决定以《突厥故国》(Türk Yurdu)杂志为“突厥之炉”的机关刊物。该杂志号称“第一份突厥民族主义刊物”,以“灰狼”图腾为标志,以民族主义、现代主义和改革主义为指导,鼓吹统一突厥语群体的文化,发表文学、社会学、历史、经济和教育等方面的作品,宣扬平民主义思想,倡导宗教改革、现代教育和妇女解放。^④在“突厥之炉”组织下,泛突厥主义者深入农村和城市开展群众启蒙运动,用举办各种会议和讲座的形式宣传民族主义,建立图书馆、展览馆展示突厥人的历史和文化成就,通过开设免费课程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传播进步思想。该组织还建立农民协会,引进先进生产技术,改善农民的卫生、教育和物质条件,发展农业经济,^⑤创办《到人民中去》(Going towards the People)杂志,向下层民众普及民族知识。^⑥“突厥之炉”为后来凯末尔主义的广泛传播铺平了道路,是20世纪初泛突厥主义的中坚力量。

首先,“突厥之炉”是奥斯曼帝国和俄国泛突厥主义思潮互动与合流的结果。泛突厥主义是突厥语知识分子主观建构的思想产物。^⑦19世纪中期,一批仰慕西方文化的奥斯曼知识分子接触了大量欧洲的突厥学研究文献,从而“发现”了自己的突厥人身份,萌生了民族意识。伊斯坦布尔大学历史学教授沃菲克·阿赫梅德(Wofik Ahmed, 1823—1891)首次在课堂讲授突厥历史,断言奥斯曼土耳其人是突厥

① 参见 İsmail Acar, *Türk Ocakları*, Balıkesir: Türk ocağı, 2004; J. Landau, *Pan-Turkism from Irredentism to Cooperation*, London: Hurst & Company, 1995; Alexandros Lampous, *Nation-Building in Modern Turkey: The People's Houses, the State and the Citizen*, London: I. B. Tauris, 2015。

② 之所以命名为“突厥之炉”,是因为炉灶在突厥游牧社会中是高贵和祖先精神的象征。关于炉灶的意义,参见涂逸嫔《丝绸之路——架起文化沟通之桥》, <http://www.jintiankansha.me/t/G39PD0Ir3G>, 2018-09-04。

③ Yusuf Akçura, *Türkçülüğün Tarihi*, İstanbul: Kaynak Yayınları, 2001, s. 148。

④ Halil Berktaş, *Cumhuriyet İdeolojisi ve Fuat Köprülü*, İstanbul: Kaynak Yayınları, 1983, s. 38, 69。

⑤ Ali Hadi Okan, “Türkün ve Türk Ocaklarının Ocaklarının Hamdullah'ı,” *Türk Yurdu*, C. 6, No. 2 (1967), s. 55。

⑥ Füsün Üstel, *İmparatorluktan Ulus-Devlete Türk Milliyetçiliği: Türk Ocakları, 1912-1931*, İstanbul: İletişim Yayınları, 1997, s. 112。

⑦ 薛宗正《突厥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第26-29页。

民族的重要分支,土耳其语是最有影响力的突厥语支系。接着,苏莱曼帕夏(Sulayman Paşa)出版《世界历史》(*World History*)一书,强调突厥人早在前伊斯兰时期便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历史与成就。杰夫代特帕夏(Cevdet Paşa)在《奥斯曼人的统治》(*The Ottoman Rule*)一书中探讨了奥斯曼土耳其语的起源问题。波兰作家穆斯塔法·帕夏·杰拉雷丁(Mustafa Paşa Celaladin, 1826—1876)改信伊斯兰教,并采用文学手法详细罗列突厥人对近代欧洲语言和文化的贡献,引起了土耳其知识分子的强烈兴趣。突厥民族理论打破了土耳其知识分子对伊斯兰教的单一认同,使他们关心和强调自身的突厥属性,形成了早期民族意识。到20世纪初,随着德国文化和德意志种族民族主义的影响力迅速上升,许多奥斯曼土耳其知识分子效仿德意志民族主义,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泛突厥主义理论。^①与此同时,俄国的突厥语知识分子也发起文化革新运动,他们效法西方,创办报纸,号召穆斯林摒弃落后愚昧思想、创办新式教育、提高妇女地位,呼吁突厥语族群加强合作与交流。此时黑海地区交通和通信条件迅速改善,促进了奥俄两国知识分子的交流,加快了两地泛突厥主义思潮的融合。在俄国的喀山、巴库、托木斯克和阿斯特拉罕等地,突厥语报纸大量登载奥斯曼土耳其知识分子的文章。在奥斯曼帝国,萨洛尼卡和伊斯坦布尔等城市涌现了《土兰》(*Turan*)、《罗姆地区》(*Rumeli*)、《突厥故国》等泛突厥主义刊物,以及“青年笔会”(Genç Kalemler)等组织,吸引了大批俄国突厥语知识分子。奥俄知识分子的频繁往来与合作,为成立“突厥之炉”准备了条件。

其次,“突厥之炉”汇集了20世纪初几乎所有著名的泛突厥主义理论家。“突厥之炉”的成员来自不同地区,齐亚·格卡尔普(Ziya Gökalp)和优素福·阿克楚拉是其中的突出代表。格卡尔普早年留学欧洲,熟悉西方思想和学术,擅长用社会学和实证主义的方法研究突厥历史和突厥民族主义。在格卡尔普看来,民族认同和民族文化是突厥身份的核心要素,他号召土耳其人加强与境外突厥人的联系,强化对突厥身份的认同。格卡尔普还发明了“土兰”(Turan)一词,用来指称所有突厥语地区,将“土兰主义”(Pan-Turanism)视为泛突厥主义的最高形式。格卡尔普痛恨俄国对奥斯曼帝国和突厥语地区的长期侵略与占领,认为俄国是泛突厥主义的最大障碍,主张先消灭俄国。格卡尔普还擅长用文学表达思想“终有一日,突厥人会摧毁敌人的领土;不断扩张,直至统治整个土兰……终有一日,那些各自为政的部落、可汗或贝伊将不复存在,只有伟大的土兰和汗王屹立于世。”^②格卡尔普的作品影响了众多奥斯曼土耳其知识分子,推动了泛突厥主义思潮的传播。俄国鞑靼人优素福·阿克楚拉是著名的泛突厥主义理论家兼活动家,他幼年随家人移居奥斯曼帝国,在伊斯坦布尔接受了文化和军事教育,1903年又回到俄国从事泛突厥主义活动,曾加入全俄穆斯林大会和俄罗斯宪法民主党。1904年,阿克楚拉在埃及报纸上发表《三种政策》(*Üç Tarz-ı Siyaset*)一文,彻底否定奥斯曼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希望奥斯曼帝国向德国种族民族主义学习,用建立突厥人国家的办法摆脱危机。^③该文被视为泛突厥主义由文化民族主义转向政治民族主义的里程碑,为阿克楚拉赢得了现代泛突厥主义奠基人的称号。^④1908年,阿克楚拉在伊斯坦布尔创办“突厥协会”,专门从事传播现代文明,研究突厥历史、语言与文化的工作。^⑤他于1911年创办《突厥故国》杂志,担任特许经营人兼董事,并招揽格卡尔普等知识分子撰稿,围绕该杂志形成一个泛突厥主义的圈子。^⑥

① [俄]优素福·阿克楚拉著,咎涛译《三种政策》,高全喜主编《大国》第4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7页。

② Uriel Heyd, *Foundations of Turkish Nationalism: The Life and Teachings of Ziya Gökalp*, London: The Harville Press, 1950, pp. 126-128.

③ [俄]优素福·阿克楚拉著,咎涛译《三种政策》,高全喜主编《大国》第4期,第201-202页。

④ N. Ye. Tikhonova, A. S. Ryzhenkov, “‘Unity in Language, Thoughts, and Deeds’: The Ideas of Ismail Gasprinskii and Conceptualization of Turkic Nationalism in Turkey,”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14, Issue 2 (2022), pp. 230-242. 著名泛突厥主义研究者朗度持类似观点,参见J. Landau, *Pan-Turkism from Irredentism to Cooperation*, London: Hurst & Company, 1995, p. 14.

⑤ Masami Arai, *Turkish Nationalism in the Young Turk Era*, Leiden: Brill, 1992, pp. 7-20.

⑥ 参见Fusun Üstel, *İmparatorluktan Ulus-Devlete Türk Milliyetçiliği: Türk Ocakları, 1912-1931*, İstanbul: İletişim Yayınları, 1997, s. 42-46.

最后,伴随奥斯曼帝国统治危机的不断加深,“突厥之炉”的影响力迅速上升。“突厥之炉”起初曾遭到奥斯曼政府抵制。1908年,鼓吹民主宪政的“统一与进步协会”(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以下简称“统进会”)发动政变上台,控制了帝国的最高权力。统进会主要由土耳其人组成,鼓吹多元宗教和民族的奥斯曼主义,幻想继续维护帝国统一,因此反对泛突厥主义思想,谴责“突厥之炉”是奥斯曼民族的“叛徒”。而随着奥斯曼主义走向破产,形势逐渐变得对泛突厥主义更加有利。为了使奥斯曼帝国继续生存,统进会三巨头恩威尔(Enver Paşa)、塔拉特(Talat Paşa)和杰马尔(Cemal Paşa)越来越倾向于支持泛突厥主义。杰马尔后来公开表示“我既是奥斯曼人,也是突厥人,坚信突厥种族是帝国大厦的基础。”^①1912—1913年,巴尔干战争爆发,奥斯曼帝国丧失了大部分欧洲领土,迫使统进会加快建立“突厥民族”国家的步伐。^②它开始有意扶持土耳其资产阶级,增加土耳其族官员的比例,将土耳其语确定为官方语言,推行公民身份的“突厥化”政策,在成立“突厥武装委员会”的同时对公民实行军事化和科学主义教育,并派人联络境外讲突厥语的民众,动员他们加入泛突厥主义阵营。^③统进会政策的转变加快了它与“突厥之炉”的合流进程,后者获准公开出版《突厥故国》杂志,配合统进会采取行动,为泛突厥主义招揽人才,甚至派阿克楚拉等人前往欧洲,劝说德国等国家支持泛突厥主义。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奥斯曼帝国在战场上节节败退,“突厥之炉”被迫收敛野心,将注意力转向安纳托利亚地区,为争取当地土耳其人的解放和独立做准备。

二、“突厥之炉”的发展与壮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导致奥斯曼帝国的彻底失败与解体,在客观上加速了土耳其民族意识的觉醒。围绕着本民族的前途命运问题,土耳其精英在战后分裂成三个阵营,分别代表泛伊斯兰主义(Pan-Islamism)、泛突厥主义和安纳托利亚主义(Anatolianism),不同阵营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在这三个阵营中,安纳托利亚主义形成时间最晚,与泛突厥主义的关系最为密切。一方面,安纳托利亚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一样,支持建立土耳其人的民族国家;另一方面,安纳托利亚主义反对政治和领土扩张,反对未来的国家与境外突厥语族群联合。在凯末尔等人的领导下,安纳托利亚主义成为一战后土耳其最有影响力的民族主义思潮,故又称“凯末尔主义”。

从1919年至1931年,凯末尔主义者与“突厥之炉”开展了一系列密切合作。凯末尔主义者此举主要出自以下几个方面的考量:首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凯末尔主义者认为,“突厥之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占领、支持土耳其民族独立,是不可多得的政治盟友;其次,凯末尔主义者和“突厥之炉”一样,在思想上深受格卡尔普等人的影响,因此对“突厥之炉”有天然的好感;^④再次,凯末尔主义者亟须利用“突厥之炉”的组织体系提高宣传和动员能力,弥补自身在这方面的不足;最后,通过与“突厥之炉”合作,可以极大提升民族主义阵营的理论水平,扩大在普通民众中的影响力,克服奥斯曼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带来的阻力。^⑤

凯末尔主义者与“突厥之炉”的合作历经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19年至1922年10月,双方主要争取土耳其民族获得解放。“突厥之炉”在一战尚未结束时便召开大会,确立了全力争取安纳

① George G. Arnakis, “Turanism: an Aspect of Turkish Nationalism,” *Balkan Studies*, Vol. 1(1960), pp. 28–29.

② Sibel Özbudun Demirel, “Anthropology as a Nation-Building Rhetoric: the Shaping of Turkish Anthropology (from 1850s to 1940s),” *Dialect Anthropol*, Vol. 35, Issue 1(2011), p. 115.

③ Bora Isyar, “The Origins of Turkish Republican Citizenship: the Birth of Race,”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11, Issue 3(2005), p. 347.

④ Ş. Hanoğlu, “Türkçülük,” in Murat Belge, Fahri Aral, et al., eds., *Tanzimattan Cumhuriyete Türkiye Ansiklopedisi*, cilt 5, İstanbul: İletişim Yayınları, 1985, s. 1399.

⑤ Kodal Tahir, “Mustafa Kemal Atatürk ve Türk Ocakları,” *Atatürk Üniversitesi Türkiyat Araştırmaları Enstitüsü Dergisi*, Sayı 52, 2014, s. 300.

托利亚地区解放、面向占人口多数的土耳其农民开展工作的基本方针。^① 所以一战刚结束，它就行动起来反对协约国的占领。1919年5月14日，“突厥之炉”的伊兹密尔支部成立“反吞并委员会”，发表《反吞并宣言》，抗议希腊对土耳其的入侵。次日，伊兹密尔被希腊军队占领，“突厥之炉”主席哈姆杜拉·苏朴希(Khamudullah Sukphi)立即赶往凯末尔处请教对策。6月6日，根据凯末尔的建议，“突厥之炉”在伊斯坦布尔组织了20多万人参加的大游行，抗议协约国违反人权和国际法，反对素丹政府投降卖国，号召土耳其人保家卫国，获得了积极响应。“突厥之炉”组织志愿者赶往伊兹密尔，支援那里的反侵略斗争。^② “突厥之炉”的一系列爱国之举遭到了协约国的报复。1920年3月，协约国占领军闯入“突厥之炉”总部，没收和破坏了那里的文献资料，逮捕和流放了许多“突厥之炉”的成员。“突厥之炉”顶住压力，拒绝解散，并设法加强与其他民族主义者的合作。^③ 1920年11月，“突厥之炉”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决定响应凯末尔的全国通电，誓死抵抗协约国占领。各地“突厥之炉”志愿者纷纷表示拥护大会决议。根据形势的发展和斗争需要，“突厥之炉”积极向凯末尔主义阵营靠拢，哈姆杜拉·苏朴希、哈利德·埃迪普(Halide Edib)、艾哈迈德·费里特(Akhmet Ferit)、优素福·阿克楚拉、侯赛因·加里普(Hüseyin Galip)等领导人先后秘密奔赴安卡拉，成为凯末尔身边的重要谋士，帮助他发展民族主义队伍。^④ 哈姆杜拉·苏朴希加入凯末尔领导的“祖国人民小组”，促使议会通过了革命纲领《国民公约》。^⑤ 阿克楚拉则以外交顾问的身份，帮助民族主义政府发展与苏联(俄)的友好关系。^⑥

1922年10月，土耳其民族独立运动获得胜利，凯末尔主义者与“突厥之炉”开始了第二个阶段的合作。凯末尔主义者勉励“突厥之炉”继续为革命服务，加快土耳其民族国家的构建和现代化进程。1923年3月，凯末尔利用视察全国的机会拜访各地的“突厥之炉”机构，开展思想动员。凯末尔在阿达纳的“突厥之炉”发表了著名的民族主义演讲，称赞“突厥之炉”犹如燃烧的圣火，照亮了土耳其人的内心与良知，并拥有推动民族文化发展的强大力量，希望“突厥之炉”奋起直追，为增强人们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而奋斗。^⑦ 凯末尔亲自主持或参加“突厥之炉”的重要会议，对该组织“为解释革命事业所做的大量而有益的工作”表示满意。^⑧

为使“突厥之炉”充分发挥作用，凯末尔为其提供了大量人员和资金支持。1922年12月29日，“突厥之炉”宣布将总部从伊斯坦布尔迁到安卡拉，凯末尔当即宣布加入该组织，成为“突厥之炉”安卡拉支部的首位成员。在他的带领下，众多议员、作家和教师纷纷加入“突厥之炉”，使其成为当时“最拥挤”的社团。^⑨ 凯末尔还多次动员军政官员为“突厥之炉”捐款，指示议会批准为“突厥之炉”建造办公大楼，每年划拨3000里拉经费。这标志着凯末尔对“突厥之炉”的支持从个人行为上升至国家行为。

“突厥之炉”领导人感谢凯末尔主义者给予的支持，热烈祝贺土耳其共和国成立，称这是凯末尔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共同取得的伟大成就。阿克楚拉夸赞凯末尔是“伟大的突厥天才”，因为他帮助突

① Füsün Üstel, *İmparatorluktan Ulus-Devlete Türk Milliyetçiliği: Türk Ocakları, 1912-1931*, İstanbul: İletişim Yayınları, 1997, s. 94-95.

② Halide edib Adıvar, *Türk'ün Ateşle İmtihanı-İstiklal savaşı hatıraları*, İstanbul: Can sanat yayınları, 2014, s. 24.

③ Yusuf Akçura, *Türkçülüğün Tarihi*, İstanbul: Kaynak Yayınları, 2001, s. 158-159.

④ François Georgeon, *Türk Milliyetçiliğinin Kökenleri Yusuf Akçura (1876-1935)*, trans. by Alev Er, İstanbul: Türkiye Ekonomik ve Toplumsal Tarih Vakfı Yayınları, 1999, s. 126-127.

⑤ İsmail Acar, *Türk Ocakları*, Balıkesir: Türk ocağı, 2004, s. 47.

⑥ Kemal Şenoğlu, "Cumhuriyet Dönemi Fikir Hayatında YUSUF AKÇURA'nın Yeri", *Yüksek Lisans Tezi*, Ankara Üniversitesi, 2008, s. 18.

⑦ Nimet Arsan, et al., eds., "Konya Gençleriyle Konuşma", *Atatürk'ün söylev ve Demeçleri*, Vol. II (1997), s. 141-150.

⑧ U. Kocatürk, *Doğumundan Ölümüne Kadar Kaynakçalı Atatürk Günlüğü*, Ankara: Atatürk Araştırma Merkezi Yayını, 1999, s. 389.

⑨ İsmail Acar, *Türk Ocakları*, Balıkesir: Türk ocağı, 2004, s. 50-51; Füsün Üstel, *İmparatorluktan Ulus-Devlete Türk Milliyetçiliği: Türk Ocakları, 1912-1931*, İstanbul: İletişim Yayınları, 1997, s. 132; H. R. Soyak, *Atatürk'ten Hatıralar*, cilt 2, İstanbul: Yapı ve Kredi Bankası Yayınları, 1973, s. 800.

厥人实现了理想,还感谢凯末尔用“土耳其(突厥)”一词为共和国和大国民议会命名,认为这是土耳其民族主义为泛突厥主义奠定基础的重要象征。^① 哈姆杜拉·苏朴希也激动地欢呼“在鄂尔浑碑铭面世1200多年以后,我们终于在安纳托利亚找到了答案。这是突厥人的权利,是年轻英雄的声音,是凯末尔建立了突厥人的国家。这是土耳其民族主义对全世界的伟大贡献。”总之,在“突厥之炉”看来,凯末尔既是土耳其的民族英雄,又是突厥世界的英雄,凯末尔主义的事业是泛突厥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正是在这一认知的驱使下,“突厥之炉”在1924年召开了土耳其建国以来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心继续发动群众,为捍卫土耳其革命、土耳其文化和土耳其语的纯洁而奋斗。^② 会议修改章程,决定将“突厥之炉”从知识分子的俱乐部转变为群众性团体,欢迎全体土耳其人加入,允许成员以个人身份参政议政。会议成立多个委员会,负责开展经济、卫生和体育等方面的工作。^③ 1927年,“突厥之炉”再次修改章程,誓言彻底追随共和人民党,“为改革派和共和国政府提供更多帮助”。^④

在这一阶段,“突厥之炉”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支持政府的语言文字改革运动,加快民族文化和民族认同的构建。在凯末尔“一个民族、一种语言”思想的影响下,1924年“突厥之炉”向议会提议,确立土耳其语为唯一官方语言,禁止公民说其他语言;1926年建议议会剥夺库尔德人的语言和文化权利,实行民族同化;^⑤ 1927年鼓动伊斯坦布尔大学的学生发起“公民,请说土耳其语!”运动,督促少数民族放弃使用本民族的语言;1928年1月响应司法部部长麦哈茂德·埃萨德(Mahamod Esad)采用拉丁字母的号召,要求政府“彻底废除旧文字”,全面清除土耳其语中的外来词汇,^⑥ 并在6月26日召开特别会议,呼吁全体国民学习新字母,彰显土耳其人的“语言实力”。^⑦ 二是传播现代知识,推广西方生活方式。“突厥之炉”支持凯末尔的全盘西化政策,称这是实现现代化的手段与目的。^⑧ 为此,它组织群众开展读书、唱歌和跳舞等活动,推广所谓的“文明”生活方式,宣传进步思想与科学知识,教导民众拥护共和主义和民族主义。^⑨ 三是参政议政,支持镇压反对派。1925年2月,土耳其东部爆发了反对世俗化改革的库尔德叛乱。凯末尔派军队进行镇压,并积极争取民众支持。为此凯末尔专门前往“突厥之炉”总部发表演讲,夸赞“突厥之炉”是“土耳其民族革命的基石”,指出“无论对共和国还是对‘突厥之炉’而言,1925年都是至关重要的一年。”“突厥之炉”也热烈响应凯末尔的号召,立即在全国掀起一场宣传战,大力批判叛乱分子,要求民众认清形势,断绝与反动势力的联系。“突厥之炉”的行动有助于平叛运动早日获得胜利,因此平叛行动刚结束后,凯末尔便下令内政部对“突厥之炉”进行嘉奖。^⑩

① Kemal Şenoğlu, “Cumhuriyet Dönemi Fikir Hayatında YUSUF AKÇURA’ nın Yeri,” *Yüksek Lisans Tezi*, Ankara Üniversitesi, 2008, s. 18; Yusuf Akçura, *Türkçülük*, İstanbul: Toker Yayınları, 2006, s. 208-210.

② İsmail Acar, *Türk Ocakları*, s. 57-58.

③ Sevda Korkmaz, Turgay Biçer, “Erken Cumhuriyet Döneminde ‘Türk Ocakları’ ve Spor,” *İÜ Spor Bilimleri Dergisi*, Cilt 8, Sayı 2 (2018), s. 4.

④ Hamdullah Suphi Tannöver, *Dağyolu I*, Ankara: Türk ocakları Merkez Heyeti Matbaası, 1928, s. 34; Şerafettin Turan, *Türk Devrim Tarihi Yeni Türkiye’ nin Oluşumu (1923-1938)*, Bölüm III, Ankara: Bilgi Yayınevi, 1996, s. 83-84.

⑤ İsmail Acar, *Türk Ocakları*, s. 68-72; Füsun Üstel, *İmparatorluktan Ulus-Devlete Türk Milliyetçiliği: Türk Ocakları, 1912-1931*, s. 195.

⑥ [英]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现代土耳其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91页; Füsun Üstel, *İmparatorluktan Ulus-Devlete Türk Milliyetçiliği: Türk Ocakları, 1912-1931*, s. 304.

⑦ İsmail Acar, *Türk Ocakları*, s. 79-80.

⑧ 曾涛《现代国家与民族构建: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365-366页。

⑨ Sinan Başha, “Cumhuriyet Döneminde Rize Türk Ocakları (1924-1931),” *Karadeniz Sosyal Bilimler Dergisi*, Cilt 9, Sayı 2 (2017), s. 70.

⑩ İsmail Acar, *Türk Ocakları*, s. 62-63; Kodal Tahir, “Mustafa Kemal Atatürk ve Türk Ocakları,” *Atatürk Üniversitesi Türkiyat Araştırmaları Enstitüsü Dergisi*, Sayı 52, 2014, s. 305.

三、“突厥之炉”与共和人民党合并

“突厥之炉”与凯末尔主义者在进行合作的同时，双方之间也存在矛盾，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不断积累，最终促使凯末尔下决心解散“突厥之炉”，将其改造成共和人民党的下属宣传机构——“人民之家”。但是新成立的“人民之家”基本沿用了“突厥之炉”的原班人马、章程、组织架构和生活方式，甚至“突厥之炉”关于土耳其人历史和语言的相关理论也被纳入官方思想体系，导致这场改造并不彻底，为泛突厥主义苟延残喘创造了条件。

“突厥之炉”与凯末尔主义的矛盾，首先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1922年10月，凯末尔便曾明确表示：“我们不会奉行泛伊斯兰主义和土兰主义的信条与政策。今后，土耳其将致力于维护自身的独立与生存，并且只在本国疆域内行使主权。”^① 日后，他又在不同场合多次严厉批评泛突厥主义思想不切实际。他还大力整合各个民族主义派别，要求它们必须在思想上与凯末尔主义保持一致。面对凯末尔的要求，“突厥之炉”表面上表示承认和尊重共和国的领土范围，否认自身有任何特殊的政治目的，^② 实际上仍坚持泛突厥主义立场，企图用泛突厥主义的观点对凯末尔主义进行解释。1923年，泛突厥主义理论家格卡尔普出版《突厥主义原理》(*Türkçülüğün Esasları*)一书，系统阐述土耳其民族主义与泛突厥主义的关系。他认为泛突厥主义有三个阶段：一是以安纳托利亚地区为基础的土耳其主义；二是包括阿塞拜疆、伊朗和花刺子模土库曼人在内的乌古斯主义或土库曼主义；三是联合雅库特人和吉尔吉斯人等远方突厥人的土兰主义。^③ 根据他的理论，所谓土耳其主义实际上就是凯末尔主义，是为泛突厥主义奠定基础的重要阶段。他的这一思想很快在国内外广泛传播。1929年6月7日，“突厥之炉”成员热西特·萨菲特(Reşit Safvet)前往布达佩斯的“土兰学会”发表演讲，宣称在凯末尔领导下，突厥人才真正发展为现代民族，^④ 言下之意便是凯末尔领导的凯末尔主义是泛突厥主义走向成功的前提条件。受此影响，第二年，保加利亚的“土兰和黄金部落组织”、塞浦路斯的“同胞之家”，以及阿塞拜疆地区的“阿塞拜疆人”等组织纷纷写信，要求加入“突厥之炉”，成为其国际支部。土耳其国内的部分媒体也对这些组织表示同情和支持。^⑤ “突厥之炉”的泛突厥主义特征引起了西方人的注意。英国人罗伯茨参观安卡拉“突厥之炉”后认为，该组织非常关心中亚并敌视苏联。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克拉克拒绝相信“突厥之炉”不干涉境外突厥人事务的说辞，还指出阿克楚拉主编的《土耳其年鉴》(*Turkish Yearbooks*)充满了对境外突厥语群体的描述。^⑥ “突厥之炉”的泛突厥主义立场有损于凯末尔主义的主导地位，不利于全社会保持思想统一，成为土耳其共和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隐患。

其次，“突厥之炉”的势力不断壮大，威胁了共和人民党的统治。“突厥之炉”支持土耳其民族独立，长期从事世俗主义和现代化的宣传教育活动，为自己赢得了较高声誉，被誉为爱国主义的榜样。它在各个领域进行渗透，为自己培养了大批同情者和支持者，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截至1930年已拥有257个支部，三万两千多名成员。^⑦ “突厥之炉”表面上宣称不干预政治，实际上已发展成为共和人民党的政治竞争对手。“突厥之炉”吸引了一部分民众的注意力，削弱了共和人民党的权威和号召力。“突厥之炉”借机控制了一些基层群众组织和部门，甚至在某些地方造成了共和人民党无

① J. Landau, *Pan-Turkism from Irredentism to Cooperation*, London: Hurst & Company, 1995, p. 74. [英]伯纳德·刘易斯著，范中廉译《现代土耳其的兴起》，第372页。

② İsmail Acar, *Türk Ocakları*, s. 75-76.

③ Ziya Gökalp, *Türkçülüğün esasları*, Eskişehir: Anadolu Üniversitesi Yayınları, 2019, s. 21-26.

④ Ilia Xypolia, "Racist Aspects of Modern Turkish Nationalism," *Journal of Balkan and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18, Issue 2 (2016), p. 117.

⑤ J. Landau, *Pan-Turkism from Irredentism to Cooperation*, pp. 75-77.

⑥ Sir G. Clark, "Turkish oaks," February 20, 1930, Foreign Office 272, No. 28, Confidential Print: Middle East, 1839-1969, https://cn.archivesdirect.amdigital.co.uk/Documents/Details/FO%20424_272_2025-03-08.

⑦ J. Landau, *Pan-Turkism from Irredentism to Cooperation*, p. 77.

法正常履行职能的局面;^①“突厥之炉”在地方选举中吸引选票,导致共和人民党候选人的得票率下降,削弱了共和人民党的政治优势,使其无法全面控制议会和政府;在泛突厥主义的影响下,“突厥之炉”鼓吹极端民族主义,抨击苏联的民族政策,公然宣扬扩张思想,要求政府成立法西斯青年组织,以拯救境外的突厥族群。“突厥之炉”的言行遭到了英国和苏联等国的强烈抗议,违背了凯末尔“国内和平—国际和平”的外交方针。^②因此,防止“突厥之炉”势力坐大并避免矛盾进一步升级,成为凯末尔主义者面临的严峻挑战。

最后,随着现代化改革和建设不断深入,共和人民党认为有必要整合“突厥之炉”等党外势力,强化中央集权,提高国家的组织和动员能力。早在1925年,有人便提议为了提高政府治理效率,应加强对“突厥之炉”的领导,或将其关闭。著名知识分子兼议员雅库布·卡迪里(Yakub Kadiri)指出,随着共和国的建立,“突厥之炉”已完成其历史使命,剩下的工作应交给组织和功能更加完善的国家机构来完成。^③的确,随着共和国建设全面展开,“突厥之炉”能力和资源不足的弊端日趋显现,表现在缺乏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完成政府交给的各项任务,经常拖政府工作的后腿。因此,整合“突厥之炉”的力量,强化政策落实,成为土耳其政府的重要选项。与此同时,国内外形势也在发生巨变。1929年,一场经济危机从美国向全世界蔓延。危机使土耳其农产品出口锐减,经济增速放缓,社会失业率和人民生活成本增加,各阶层对共和人民党的不满情绪迅速上升,世俗化和现代化改革面临空前压力。为了缓解社会不满,消除领导层之间的矛盾,凯末尔在党内人士的建议下,于1930年8月批准成立了一个名为“自由共和党”的反对党,“以营造讨论经济的有利气氛”。^④但是形势发展明显超出了凯末尔的预计,自由共和党很快蜕变成宗教保守派和政治对手的保护伞,甚至“突厥之炉”的骨干艾哈迈德·阿奥卢(Ahmet Aoglu)、热希特·加里普(Reşit Galip)和苏朴希等人也加入其中。^⑤随着政治分裂加剧,各地的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多,暴力事件此起彼伏,甚至东部地区的部分政府机关遭到袭击。面对复杂而严峻的国内形势,凯末尔决定加强中央集权,重建一党统治,实现对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他下令解散自由共和党,要求教师工会、妇女协会、全国学联、记者协会和预备役军人协会等停止活动。^⑥

凯末尔重点讨论了“突厥之炉”的去留问题,经过与党内人士和“突厥之炉”领导人多次商谈,最终于1931年3月24日宣布将“突厥之炉”与共和人民党合并。凯末尔充分肯定了“突厥之炉”对土耳其革命做出的贡献,指出在特殊困难的时刻,为了保卫国家和革命事业,有必要集中全部物质和精神力量,包括民族主义和共和主义的力量。他强调将“突厥之炉”与共和人民党合并的目的是让它们“为了共同的事业联合起来”。^⑦4月10日,“突厥之炉”召开了最后一次特别大会,随后宣布停止运行,并将财产全部移交给了共和人民党。5月份,共和人民党决定成立“人民之家”来取代“突厥之炉”。“人民之家”的各级负责人由共和人民党的高级领导人兼任,活动经费纳入党的预算。^⑧

凯末尔解散“突厥之炉”的行动看似给泛突厥主义造成重创,实则给泛突厥主义提供了继续存活的机

① İsmail Acar, *Türk Ocakları*, s. 93-94.

② Volkan Kiliç, “Disciplining” Turkish People Through the People’s Houses: A Discursive Reading of the *Ülkü Magazine* (1933-1950), Master Dissertation, İstanbul Şehir University, 2017, p. 37.

③ İsmail Acar, *Türk Ocakları*, s. 63-66.

④ [土耳其]悉纳·阿克辛著,吴奇俊、刘春燕译《土耳其的崛起(1789年至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28页。

⑤ İsmail Acar, *Türk Ocakları*, s. 93-94.

⑥ Sefa Şimşek, “‘People’s Houses’ as a Nationwide Project for Ideological Mobilization in Early Republican Turkey,” *Turkish Studies*, Vol. 6, No. 1 (March 2005), s. 75.

⑦ İsmail Acar, *Türk Ocakları*, s. 87-88.

⑧ Kemal H. Karpat, “The People’s Houses in Turkey: Establishment and Growth,”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17, Number 1/2 (Winter-Spring, 1963), pp. 55-67.

会。第一,经过多年经营,“突厥之炉”已在土耳其政界、军界、知识界和广大青年中培养了大批支持者,这些人在“突厥之炉”被解散以后,依旧同情或支持泛突厥主义;第二,凯末尔在解散“突厥之炉”的过程中并没有对其成员进行清算,而是保留了原班人马,允许热希特·加里普、优素福·阿克楚拉和穆斯塔法·内兹哈提(Mustafa Nezhat)等人继续在政府任职,或者在“人民之家”工作;第三,新成立的“人民之家”沿用了“突厥之炉”的任务使命和组织架构。根据“人民之家”的章程,该组织和“突厥之炉”一样,以宣传革命理想、教育广大青年和群众、整理民族文化、贯彻民族主义和共和主义精神、巩固民族国家和推动西式现代化建设为主要任务。^①在“人民之家”下设的14个部门中,有9个来自原“突厥之炉”,包括语言组、历史组、美术组、戏剧组、体育组、社会救助组、人民课堂组、图书出版组、农村工作和博物馆展览组等;^②第四,“突厥之炉”关于突厥历史和语言的理论被凯末尔主义采纳,成为建构土耳其历史理论和语言理论的主要依据。^③“土耳其历史研究组”(次年独立并更名为“土耳其历史学会”)和“土耳其语言研究组”(后更名为“土耳其语言研究所”)于1930年成立,负责研究土耳其的历史和语言问题,并向民众普及相关知识。这两个研究机构在参考泛突厥主义种族学说的基础上,分别于1932年7月和1936年8月提出了著名的“土耳其历史理论”(The Theory of Turkish History)和“太阳语言理论”(The Sun Theory of Language),主张土耳其人是来自中亚地区的突厥种族;上古时期的突厥文明深刻影响了世界其他主要文明,包括后来的欧洲文明;^④土耳其语属于印欧语系,是上古时期突厥人太阳崇拜的产物,也是世界其他主要语言的源头。凯末尔主义者认为,这两种理论充分彰显了土耳其人在历史和种族方面的优越性,揭示了突厥文明对欧洲文明的贡献,有利于增强民族自信,因此在全国大力推广这两种理论。^⑤凯末尔解散“突厥之炉”的主要目的不是消灭泛突厥主义及其影响,而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强化土耳其人的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但是这样做的后果,等于为泛突厥主义延续了人员和理论支撑,为日后土耳其实行泛突厥主义外交埋下了伏笔。

余 论

当前,泛突厥主义作为一支重要的地缘政治力量,正活跃在中亚、中东和高加索地区,对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构成威胁,因此有必要加以关注。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对泛突厥主义的研究必须综合考虑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因素。“突厥之炉”与凯末尔主义的合作经历充分反映了泛突厥主义的持久性和顽固性。作为一种特殊的民族主义思潮,泛突厥主义为推动土耳其民族意识觉醒和土耳其民族国家建立做出了贡献,在思想上也与凯末尔主义有内在关联:凯末尔主义摒弃了泛突厥主义的政治和领土扩张思想,但是保留了后者关于土耳其民族和文化起源的一些理论。

“突厥之炉”与凯末尔主义赖以合作的基础,是双方都主张争取土耳其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渴望追赶现代西方文明。但是双方的合作带有很强的功利性,本质上是为了相互利用。“突厥之炉”帮助凯末尔主义实现建国理想,同时又积极扩大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政府和社会层面的影响,与凯末尔主义在意识形态、政治权力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的矛盾逐渐凸显,具体表现为破坏土耳其与英国和苏联等国家的外交关系,削弱民众对凯末尔主义的政治忠诚,妨碍共和人民党履行治理职能等。这些矛盾构成了凯末尔解散“突厥之炉”、另行成立“人民之家”的重要因素。但凯末尔允许

① Kemal H. Karpat, “The Impact of the People’s Hou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 in Turkey: 1931–1951,” *Die Welt des Islams*, New Series, Vol. 15, Issue 1(1974), p. 69.

② Alexandros Lampous, *Nation-Building in Modern Turkey: The “People’s Houses,” The State and the Citizen*, London and New York: I. B. Tauris, 2015, p. 35.

③ George G. Arnakis, “Turanism: an Aspect of Turkish Nationalism,” *Balkan Studies*, Vol. 1(1960), p. 30.

④ Soner Cagaptay, “Race, Assimilation and Kemalism: Turkish Nationalism and the Minorities in the 1930s,”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0, No. 3(2004), p. 88.

⑤ [土耳其]M·许克吕·哈尼奥卢著,时娜娜译《凯末尔传》,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62–175页。

“人民之家”保留“突厥之炉”的原班人马、使命任务和组织架构，并将“突厥之炉”的历史理论和语言理论纳入官方思想体系，为泛突厥主义提供了新的生存机会。

1938年，凯末尔去世，土耳其进入后凯末尔时代，泛突厥主义随之有了新的动向。凯末尔的去世使泛突厥主义者摆脱了强有力的政治约束，而同时期德国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崛起，则给予泛突厥主义者极大的精神鼓舞。1939年二战爆发，希特勒准备进攻苏联，暗中向泛突厥主义者提供训练和资金支持，^①促使泛突厥主义者更加活跃。他们创办刊物，并成立了“统一”“灰狼”等秘密组织。1942年，土耳其泛突厥主义者组成“突厥文化联盟”，公开举办各种庆祝和展览活动，对所谓“土兰”地区的突厥语群体进行声援。鉴于德国法西斯主义逐渐走向失败，为避免激怒苏联，土耳其政府开始遏制泛突厥主义的发展，于1944年关闭了一些极端组织，将许多极端分子投入监狱。^②但是在部分官员的庇护下，这些极端分子很快被无罪释放。二战结束后，泛突厥主义分子得以继续活动，打着反共反资本主义的旗号骚扰和迫害进步知识分子，阻碍土耳其社会科学等领域的发展。^③在教育方面，战后土耳其历史教科书沿用泛突厥主义的种族和历史假说，导致年轻一代普遍关心中亚国家，同情境外突厥语族群。1991年苏联解体，土耳其部分党派主张加强与中亚国家的联系，并因此在选民中获得支持。^④此后，泛突厥主义对土耳其外交的影响日趋显著，“突厥之炉”与凯末尔主义早期合作的历史影响得以凸显。这提示我们在研究泛突厥主义时，既要分析它的思想和组织变化，又要关注它与周围社会、政治力量的互动关系。

(附记：本文在搜集土耳其文资料时得到了李明隽同学的大力协助，特此致谢!)

责任编辑：郑广超

The Early Relationship Between Pan-Turkism and Kemalism: An Investigation Centered on the Turkic Ocaklar

MIN Ji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20, China)

Abstract: By studying the cooperation process between the Turkic Ocaklar, a Pan-Turkic organization, and Kemalism,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Pan-Turkism ha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ürkiye's national consciousness, the national independence movement, and the building of Turkish nation state. With the merger of the Turkic Ocaklar by the Republican People's Party in 1931, Pan-Turkism personnel and their ideas also been assimilated into Türkiye's mainstream politics, laying the groundwork for the later revival of Pan-Turkism in Türkiye's foreign affair. The Pan-Turkism factor in contemporary Türkiye's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ies is derived from its early cooperation with Kemalism.

Key words: Türkiye; Pan-Turkism; Turkic Ocaklar; Kemal Doctrine; Republican People's Party

① Jacob Landau, *Jews, Arabs, Turks, Selected Essays*, Jerusalem: Magnes Press, 1993, p. 180.

② George Lenczowski, *The Middle East in World Affair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2, pp. 142-143, 145-146.

③ Sibel Özbudun Demirer, "Anthropology as a Nation-Building Rhetoric: the Shaping of Turkish Anthropology (from 1850s to 1940s)," *Dialect Anthropol*, Vol. 35, Issue 1(2011), p. 127.

④ Didem Mersin Alici, "The Role of Culture, History and Language in Turkish National Identity Building: An Overemphasis on Central Asian Roots," *Central Asian Survey*, Vol. 15, Issue 2(1996), pp. 226, 230.